发展中国家政治与对外关系  
**Politic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授课教师**俞沂暄 讲师（[yuyixuan@fudan.edu.cn](mailto:yuyixuan@fudan.edu.cn)）

**助教**朱定泽

**目录**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_Toc191541553)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2](#_Toc191541554)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2](#_Toc191541555)

[（二）“第三世界” 2](#_Toc191541556)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3](#_Toc191541557)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3](#_Toc191541558)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3](#_Toc191541559)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5](#_Toc191541560)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25.2.20 / 2025.2.27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与发展中国家相关。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南方国家”；而“南方”的称呼又来自于上世纪60~70年代对世界“东西南北”的划分，因为南半球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北半球多为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时至今日，与“南方国家”相对的是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世界。

“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最初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使用，“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 country）”起初则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近乎全同。在当今的政治界与学术界，这两个概念已较为少用。

“新兴民族国家”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外交场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国家的称呼，在当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意义一致。

可见，在上述这些术语之中，有些术语是纯描述性的，而另一些术语则具有政治意味。

（二）“第三世界”

1. “三个世界”及其划分

“第三世界国家”是较为常用的指代发展中国家的术语。最早提出“第三世界”概念的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他以法国历史上的“三级制”为灵感，于1952年提出了“三个世界”：

* **第一世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 **第二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 **第三世界：**上述两类之外的国家。

由此可见，在索维的定义中，第三世界的特征是没有经过工业化且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索维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实现工业化。在这种划分中，中国应当属于“第二世界”；但也应当注意，当时的索维在定义“三个世界”时，对“第二世界”的定义多是参照苏联制定的，可能并未考虑中国。

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 **第一世界：**美苏；
* **第二世界：**东西欧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
* **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即整个亚非拉（除了日本）。

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对日后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如此划分的根据可以概括为：第一世界既富且强（核武器储量高、打击能力强），第二世界较富较强，第三世界既穷且弱。

2. 冷战之中与之后的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1964年由77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上提出。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作为同义词使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标志性事件、组织包括1955年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

冷战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世界政治两极结构结束后，不依附于两大集团的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大大降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立场，共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发展途径上与西方趋同，失去了原有的第三条道路或立场的独立地位。可以说，冷战后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已面目全非——按索维的定义，第二世界已然消失；按毛泽东的划分，世界战略图景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第三世界”也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冷战后，“第三世界”的称呼逐渐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分化严重，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与最不发达国家之分。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 低生活水平
  + 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
  + 贫富差距极大
  + 赤贫人口（即极端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为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超过1.9美元）多
  + 预期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
  + 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 人口出生率高
* 失业率高
* 依靠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发展经济学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发展经济学也产生了诸多理论。

1. 线性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一种线性的规律，这一规律已被包括英美在内的诸多西欧、北美国家验证，因而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非正确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被视作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表象的总结，其中包括以下阶段：

* 传统社会
* 起飞前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 高消费阶段

罗斯托指出，经济的起飞必须要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传统）农业与工业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农业“靠天吃饭”，以气候为主的自然因素为农业生产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第二，传统社会中农民依靠自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因此，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总剩余才会提高，才有资金进行投资，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工业化逐步发展后，随着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工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就逐渐走向起飞了。

虽然作为一个封闭的抽象模型而言，罗斯托的理论揭示了较为正确的规律（尤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但其实践意义非常有限——例如，虽然罗斯托指出了农业生产率要提高，但没能揭示传统农业如何产生剩余；事实上，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是很难产生剩余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也显然不是通过农业剩余实现的。人类历史至今唯一能通过传统农业产生剩余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只有20世纪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一过程也并非罗斯托主张的“自然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是受国家高组织化强烈干预的结果。此类国家的典例就是中国，而中国又有其特殊条件，如中国悠久的农业传统与水利积淀。

2. 新古典主义理论

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所谓“二元经济”，就是两个经济部门大类：一个是传统的、人口过剩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城市产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平均收入，充分就业。那么，一边是人口过剩，另一边是充分就业，就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达到农村产出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时，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刘易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数学经济模型，因而忽略了一些因素：例如，城市产业部门从何而来？即使将这一点作为默认条件，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能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从而吸引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换言之，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要扩大再生产，资产者不能将利润用来消费，而是用来投资；要扩大再生产，需要对一些基础产业（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的见效更慢，因而不为资产者所欢迎，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些规律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没有提及的。

3. 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模式

普雷维什进口替代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中心-外围”理论，即结构主义这一在批判新古典主义之上形成的流派。普雷维什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只能适用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这样的市场。因此，要首先解决结构问题，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以低价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以高价进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品。

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源于历史。要打破这种恶化，就需要打破“外围”对“中心”依附的结构制约——进口替代，以自行生产替代进口。

在实践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执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可以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除了一些东亚国家之外，大多数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尤其是在拉美和非洲）都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世界陷入的债务危机。它们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在于低竞争力的产业加上高关税的贸易保护的不合理匹配；此外，进口替代一般由国家大力支持，投入巨大资源，导致大量人员涌入进口替代的产业，形成冗员，加大成本。工业生产的复杂性也是原因之一，资本、技术等流程之间无法打通，就需要进口，进口依赖硬通货，硬通货不能依赖低竞争力的工业品，于是只能依赖其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但是，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又已经忽视了农业，农产品的出口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只能举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下的美联储宣布加息，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已无法还清债务，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进口替代理论在理论上相比线性发展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了一定进步，但在实践上遭遇了重大挫折。当然，进口替代理论虽有问题，但“进口替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4. 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是阿明的依附型经济理论。阿明指出，依附型经济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简单地依附于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因为外围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和劳动等都分散在各个外向型部门里，不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民经济看待。外围国家经济的各个部门分别和世界经济的某些分支联系在一起，而相互之间却是分割的，在国家层面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合力。依赖外国投资和援助使得本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利于跨国公司谋取利益，加剧了国内的分化，加深了依附地位。

针对此类依附型经济，阿明难以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唯一提出的方案“孤立”，在实践上也较难落实。

5. 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理论乃至整个发展经济学都陷入困境，因为理论无法回应7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从此，新自由主义重新夺回对世界经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解释的主导权。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1.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的结构主义路线，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按市场规律发展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债务危机，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

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按新自由主义进行的“结构调整”，其总体思路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参照系。1981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伯格报告》，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部分接受《伯格报告》，但迎来了失败的结局——“掉进了深井”：低投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削减、消费减少、生产下降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财政纪律，减少财政支出，这导致了投资减少，原有的产业也难以维持，失业于是增加，福利于是削减，消费也随之减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彻底摧毁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直到21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才有所回升。

2. 对东亚经济成功的研究——制度主义

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大多陷入困境时，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基于对东亚（不包括中国）研究的制度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外部约束，但倘若一国的政策足够有力，就能够抗衡这些外部约束。当然，此类抗衡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

要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就需要一场政治社会变革，就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集团影响政府的权威和权力，其中前者在东亚国家就主要指大土地所有者；而东亚国家（及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都进行过土地改革，破除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解放了农民的人身依附。此外，东亚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也在其中提供了助力。要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就需要在社会变革之中建立良好的制度，调整产业界与政界的关系。

在确保了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后，就要出台合适的产业政策，在一段时期的进口替代后，及时转向出口导向。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出口导向产业大多为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产业，面向的市场则是已有的国际市场，产业具有竞争力，能够产生相当的利润，由此就能吸引投资，扩大再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还会调整产业政策，开拓新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也有一些制度主义学者指出，东亚经济腾飞还有一个辅助条件，即国际契机。例如，日、韩由于处于冷战的前线，因而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中国把握的国际契机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以及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契机”只是一个“辅助条件”吗？讲师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远超内部因素。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源头来自外部；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的债务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加息；日、韩等国的成功之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因此，没有国际契机，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发展其经济的。

3.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